

对话

福州大学党委书记陈永正:

“一带一路”贵在视野和胸怀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国人勾画了一幅走向世界的宏伟蓝图。作为智库建设重地的高校,“一带一路”战略还牵动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以往重点高校更多是大国战略的受益者,而如今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211工程”高校尤其是有地缘优势的高校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当中的难点何在,他们又该作好哪些准备?为此,记者采访了福州大学党委书记陈永正博士。

“211工程”高校的角色

《中国科学报》:请问“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给高校带来何种新的机遇与挑战?

陈永正:“一带一路”战略把国人的视野扩展到全球。过去提到国际化,人们常关心的是旅游、留学,现在则开始关注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大项目,这是与世界迅速接轨的一大趋势。从高校办学国际化角度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一是“优进优出”促发展。以往我们讲国际化常强调引进,吸纳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但现在仅这些已经不够了,无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服务社会、引领文化,都必须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而得到拓展。为此,高校也应积极“走出去”,为国家战略和“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建设服务。

二是深化改革增动力。对于高等教育,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般的民生工程。在国际化办学进程当中,还应着力通过“优进优出”,倒逼、促进和深化高校的综合改革,进一步释放推动学校建设发展的动力,拓展学校事业发展的空间与平台,提升学校的办学条件、实力与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作出贡献。

三是人才培养需提升。这里的人才培养既包括中国的人才培养,还可以包括“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本土化人才培养。在国际化学术进程中,以往我们对学生的培养注重国际中文语言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学习。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和影响力的扩大,我国在资本、产能、企业、项目等“走出去”的同时,也应开始对来华留学生加强科学技术、工程、经贸、管理等全方位的学习和培训,为世界培养人才。

四是国际视野应拓展。过去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都是在国内进行,现在看来是不够的。高校应积极拓展国际视野,更加主动地承接国际性业务,进一步调动国内和周边国家的力量,共同积极参与相关工程项目的技术服务、管理等服务。同时,高校还可以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加强智库建设,组织专家学者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做好建言献策、咨询策划等服务。

“走出去”难点何在

《中国科学报》:福建省是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高校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印象中,东南沿海的高校学子去国外工作是比较自然的事。

陈永正:实际上并非如此。福建虽有很多海外华侨,但有不少是早年漂泊海外谋生。他们与国内联系往往依靠民间、个人关系,缺少相对固定的机制和通道。因此,要到国外工作或承接国外项目等,对于普通高校师生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们可以通过主动拓展和承接政府、企业项目,使对外联络的机制和通道进一步固定和顺畅起来。

《中国科学报》:高校在为“一带一路”战略作准备过程中,首先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陈永正:我觉得,首先应该是视野和胸怀。比如,在当前背景下,福州大学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国际优质资源,另一方面也要立足福建省情,结合东南亚等地众多华裔的历史渊源,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等海外开展国际合作,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与挑战,也是新的机遇,必须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我感到现在有不少地方高校缺少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乃至为全人类谋福祉的情怀,仅仅狭隘地局限在为本地方服务。但实际上,很多“211工程”高校既是省属高校,同时又被列入国家建设行列。因此,还应主动承担国家战略和时代赋予的重任,包括积极地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

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是很多人的梦想。现今媒体对海外的宣

“高校要创造条件鼓励有志于闯世界的学子,提前去他国做了解,开展更深入的交流,使其感觉到世界离自己很近,很多的事情自己大有可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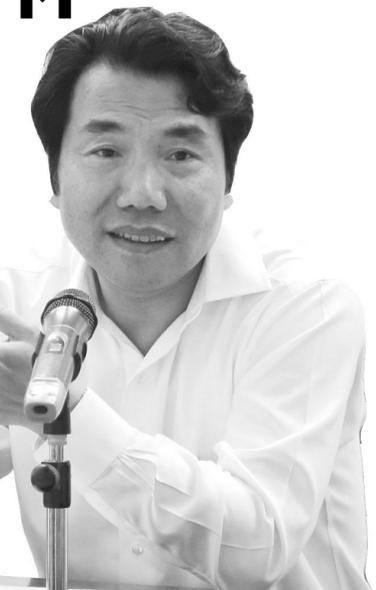
传常以灾难性质的负面报道居多,容易让人觉得在国外生活比较艰苦和危险,很多人不敢或不愿出国工作,这方面的宣传需要作一些调整。不少高校学生毕业后往往选择就地工作,沉湎于儿女情长的小“安乐窝”,局限于很小的幸福圈。我认为,高校在此方面应多培养学生胸怀大志、放眼世界、勇于担当的勇气和魄力。

《中国科学报》: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难点?

陈永正:目前对于“走出去”,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因为语言是基础。但相比之下,在国人的法律制度、文化习俗、技术标准等则显得更为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这点其实并不难解决,难的是人们的观念问题,这依然关乎视野和胸怀。

高校可以引导什么

《中国科学报》:眼下,为了让广大师生积极



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高校可以做哪些工作呢?

陈永正:作为一所创业型高校,我们鼓励师生保持建功立业的追求,将事业的舞台从国内拓展到国际。

一方面,学校要努力培养师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不仅关注个人家庭生活,还积极地回报父母、建设故乡、报效国家,乃至有为全人类进步作贡献的胸怀。另一方面,学校也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有志于闯世界的学子。比如,在校内举办各种学术讲座,深入开展国际交流等,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法律制度等,使其感觉到世界离自己很近,很多的事情自己大有可为。

我认为,高校应当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博大胸怀的有志青年,这种教育还需要整个社会都重视起来,协同配合进行。

记者快评

过于看重『创业比例』或致『拔苗助长』

■陈彬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时代主题,大学生创业也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不久前,共青团广东省委发布《广东青年创业就业蓝皮书2015》。在这份蓝皮书中,两个数字引起了舆论和媒体的普遍关注——有五成本科生有创业意愿,但是真正自主创业的比例不足1%,明显低于全国2%的平均水平。

对于广东青年创业热情和低创业率形成的巨大反差,公众可以作出很多解释,但这一数字是否真的像看上去的那么“刺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全国2%的平均水平,应该是指不久前第三方调查机构麦肯思公布的2014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的自主创业比例。但要注意的是,这一比例指的是“本科毕业生”而非本科生。

至于全国本科生的自主创业比例,去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星曾表示,大学生创业比例大概在1%左右。

在说这句话时,信长星也表示,毕业后过几年创业的人数会高于这个数,而这句语其实更切中了目前我国创业教育的要害。

在一般人看来,创业教育只是大学的阶段式教育,学生在此阶段创业成功了,创业教育就成功了,反之则是失败。但殊不知创业教育其实是贯穿人们学习和工作始终的连贯式教育,而且与在校期间的创业相比,毕业后的创业才更具针对性,也更容易成功。

在笔者参加的一次创业论坛上,国内某知名企业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反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创业,因为此时学生的创业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且缺乏必要的技能,这种能力既包括把握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也包括沟通、表达等软实力。因此,大学生首先要做的是就业,并在就业中积累经验,适时再自主创业。

按照这一思路,大学生的创业比例不高,似乎也代表不了什么。

事实上,大学只是一个人创业征程的最初起点。此时,过高的关注其“成功率”很可能拔苗助长。因为在校学生的能力均不健全,这一阶段我们最需要的是在他们心中植入一颗创业的种子,并在未来为他们准备好政策、资金等方面的便利环境,至于这颗种子何时发芽,其实并不十分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成本科生具有创业意愿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高教观点

高等教育面临的种种难题,其根本还是市场影响着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大学在坚守其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必然与其发生冲突。

以教改促学风教风建设

■高蓓蕾

当高等教育大众化扑面而来,高等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一座座大楼在大学校园里拔地而起的时候,我们为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然而当学生“逃课”“抄袭”“网瘾”愈演愈烈之时,当导师不导、教授不教“蔚然成风”之时,我们也不得不静下心来反思高等教育面临的种种难题。

其实在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包括美国、日本、韩国都曾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美国从二战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经历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期,经济危机、社会信任危机导致了生源危机,教学质量持续下降。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大学入学委员会的学术性测试(AST)成绩逐年下降,许多公立四年制院校不得不开设数学、科学、写作、阅读方面的补习课,当时的数学补习课占全部数学课程的1/4。正是这种危机导致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学生消费者至上”的观念。高等学校出现了从注重学术价值到注重学生作为消费者的转变。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重大方向上的转变。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其根本还是

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影响着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大学在坚守其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必然与其发生矛盾和冲突。市场追逐即时效益和利益最大化,大学追求高深学问和理想主义,教师以知识为中心,而学者把接受教育作为投资,期待毕业后的高额回报。教师、学者在追求理想的精神贵族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和利益诱惑。这些矛盾和冲突集中反映在学风、教风上,反映在大学的办学理念上。

学风、教风是价值观、动机、态度和行为取向的综合体现。行为可以约束,然而价值和情感态度受社会生活、社会整体价值取向以及个体生活和个性因素的影响,是行为的根本推动力,它无法简单约束。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因此学风、教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

首先,学风、教风建设要有健全严格的制度作保证。所谓“教”与“学”如果仅仅是一个行为并不,“教好”和“学会”两者都需要付出大量的艰苦劳动,有了严格制度约束才能有良好的行为规范,也才能保证教学的效果和效率。

其次,学风、教风建设要有良好的管理和激

励机制。良好的管理和激励机制必将影响教师和学生的心态和态度,进而影响行为取向。管理和激励机制是大学办学理念的具体体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教师的劳动能否得到尊重都会在管理和激励机制中得到反映。除了用模范教育、影响和感染教师外,更多的还是让教师能够切身感受到教学工作被尊重,体验到教学工作所带来的个人价值,教师才能倾心投入教学。对于学生,只有感受到接受教育的价值,才能够找到成就自我发展的平台,才能努力学习。

因此,深化教学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学校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更要把教学的中心从知识和教师转移到学生身上,为学生提供学习指导,为学生的多样化发展提供平等和丰富的机会。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中阐述教育的经济原理时提出确定课程体系的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弄清楚哪些东西是学生将来的生活必定需要的;二是绝对需要的内容还必须缩减,以使学生能够真正学会和理解。这一原则正是我们大学教学改革的重点。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教师)

向考生公开评阅试卷靠谱吗

■熊丙奇

评,这不是给有权有势者公开作弊的机会?知道是某人的答卷,因此把作文提高几分,甚至对答案进行修改,这种情况如何杜绝?

匿名阅卷是保证考试公平的基础,向考生开放评阅试卷可以说是一种“想当然”。我国高考试卷的评阅质量问题必须解决,但解决的办法不是逐一复评试卷,让学生“见证”,而是要从提高评卷者素质、责任心,以及建立考试竞争机制入手。

目前高考的阅卷周期太短,笔者曾经建议,要适当延长高考阅卷时间,不能“赶工期”。“赶工期”导致阅卷草率,甚至被质疑“草菅人命”。而之所以阅卷赶工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配合填报志愿、录取流程,有的省市在6月22日,也就是高考结束还不到半月的时间就公布高考成绩,之后紧锣密鼓地开始填报志愿,7月初开始录取。事实上,大可不必如此着急。我国高考相比2003年之前已经提前一个月,高考阅卷完全可以再多几天——时间是阅卷质量的基本保障。

另一方原因则是为了节约阅卷成本,请老师阅卷是要花钱的,而现在支付的阅卷费用不

高,有的阅卷点就加班加点,争取在几天内搞完阅卷,阅卷老师阅卷读到麻木。前些年,还曾曝出组织在校大学生阅卷考卷的丑闻。这十分令人不解,为何在如此重要的阅卷中,有关部门如此“节约”?不仅如此,据笔者了解,在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很难找到愿意监考的老师,压力大不说,监考劳务费很低,两天监考下来,老师的劳务费只有200元。有的地方只有“抓差”找小学老师监考,还有的则由老师所在学校补贴。

招生是十分重要的教育环节,国外大学在招生中投入很大的成本——这不但关系到学校招到合适的人才,也对基础教育传出积极信号,还保障评价的公平。可我国却为了追求招生的效率,不愿意在考试、评价环节投入更多成本,这和我国的“考试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虽然高考已恢复30多年,但由于对考试、招生缺乏足够的投入,包括研究考试、完善试题、改善评卷等,每年我国的高考试卷水平都会遭遇吐槽,有时还会犯低级的错漏问题。基于此,国家提出要增加使用全国卷的省份,这可以缓解各地高考卷参差不齐的问题,但全国卷的质量问题也必须注意。

域外传真

这学期我一直教授本科生“新闻伦理”这门课,其中涉及到很多对《每日邮报》的批评。但就在最近,我遭遇了道德困境。因为作为老师的同时,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我曾希望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但一个同事看过后表示,目前的报纸充斥着类似的文章。

出于实际的想法,我想向报纸出售我写的故事,但作为学者,我研究的正是新闻自由市场的失败,信息的同质化、娱乐化。我觉得我的做法有些虚伪。

最后,我决定不发表我的稿件。因为我知道一旦自己这样做了,我将无法面对我的学生。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当一个人跨越现实世界和学术界时,可能遭遇何种挑战。

新闻学院和媒体业界正在不断融合,这也影响了学生和教师双方的水平。一份2013年的记者工作报告数据表明,82%的记者都拥有一个学位或更高级别的学历,而对普通的英国工人来说,这一比例只是38%。这样的对比表明,新闻是一份高素质的职业。

同时,新闻课程的任课老师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曾经是记者或现在仍是记者的人,他们往往正在或者考虑在学术方面进一步深造,这是好事。但他们不一定满足学术训练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加剧了一个悖论——传统共识认为,新闻教育应该注重实用的职业技能,包括速记、搜集新闻和新闻写作。但当我们把新闻放在一个学术环境里考虑时,它的核心业务变成了研究。

今天,尽管实践型学者在大学里已经十分普遍了,但考虑到已转型教授的职业技能课程大量激增,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的鸿沟仍然存在。

从业者是学者——他们正越来越多地成为高等教育学院的研究员和领域内的演讲之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为真正的学者了。谢菲尔德大学学者托尼·哈珀曾采访过这类新闻教育家。他在2011年就发现,“研究和教学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都存在脱节。”大学希望从业者成为活跃的研究人员,但在现实中几乎未曾真正实现。

作为介于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学者,这些身份混合在一起,我发现自己处境危险,又似乎成了两大阵营之间的桥梁。

我认为自己是一名记者,因为我受训磨练了多年的职业仍然拥有一定的功底,而这些是某些讲师自己都做不到。但我明白,研究对我的教学和实践均有启发,因为它给了我判断情境和反映的能力。同样,新闻实务的经验令我在学生眼里更可信和有说服力,也确保我及时了解行业的发展。

但总的来说,记者倾向于模仿学界,但是业界却不再提供业务训练。在我的博士研究中,我采访的记者都对我的发现很感兴趣,但同时也对我为什么要把研究结果发布在其他媒体上感到不解,他们对同行评审的出版物也只有模糊概念。

一只脚在学术界,一只脚在工业界,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当高校试图招聘一些技能类课程的员工,如新闻、电影、媒体、计算教师时,他们经常面临各种招聘问题。怎么能设计出一种不会排除掉所有有潜质的应聘者的招聘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在英国,你认为有多少体育记者博士?在面试过程中,什么条件更重要?和足球俱乐部的关系还是有价值的学术发表作品?

大学招聘讲师时应该优先考虑什么?在我所在的学术机构,全职员工一年有170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作为学者,他们能将其用于参加适合的职业或学术活动。这一切都导致了工作选择的问题。最近我决定要继续工作——作为自由记者和教授实用技能的老师,而且我还要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并教授理论模块。问题在于,这种大学的招聘工作广告挂出时,就经常作为招聘研究者或从业者的帖子。所以,未来究竟什么类型的职位应该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混合身份人员申请?大学目前所提供的都是令人困惑的信息。

我很幸运在目前的机构内,能够在作研究的同时也被鼓励继续做一名自由记者。但我知道我的很多同行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意味着我的未来就业前景是有限的,除非我选择一边或另一边。

(作者供职于《卫报》,本报记者韩琨编译)

被媒体嘲笑、被大学扼杀的新闻学者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